



天国里的风筝

□钟倩

“走，我带你出去逛逛，看看广场上有放风筝的吗？天暖和了，不能老在家呆着，你得出去多晒晒太阳，医生也让晒太阳。”忘记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变得婆婆妈妈起来。

“我知道你不愿见人，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？摊上了就得面对，你别那么倔，太倔了会吃亏。”见我不仅不吭声，他穿好外套，拎着水壶，下楼推三轮车去了。

“你想吃什么就和我说说，我下班给你买回来。吃好了，身体才能好。别给你妈说。”在广场上，我坐在三轮车上张望，他眯着眼睛眺望高空的蜈蚣风筝，一边和我说道。

这是我刚得病那会儿，父亲经常说的话，一晃眼，22年过去了。经常，我一觉醒来，看到父亲刚下夜班，带回一股湿湿的凉气，他脱下棉大衣，洗手准备吃早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怯怯问一句：“昨晚又疼了吗？”我装作没听见。围在桌前低头吸溜吸溜喝面条时，才想起来，他昨天夜里回来过一趟，问我有事吗。望着他熬得发红的眼圈，我的鼻头一酸。醒来时分，才发现，这是一场梦而已。

癸卯年清明，父亲离开我们1009天，马上三周年了，我却觉得一切恍若昨日。他的说话声、吃饭声、写字声，以及发脾气的样子，时不时在我眼前一遍遍地回放，仿佛在对我说：“你啊，还那么倔强，越来越像我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笑出声来。我多么想反驳他几句，却发现已经没有机会。

我对父亲的感情远远超过母亲。第一次品尝到父爱的味道，那是在童年时。有一次，在楼下空地上玩耍，有个比我年龄大且个子高出一头的男孩做游戏时伸手恐吓我，那一幕被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了，他把男孩单独叫过来，声色俱厉地对他说：“她是女孩，你比她大，以后不能欺负她。如果再让我遇见，就不客气了。”从那以后，那个男孩远离我，其他男孩也不敢欺负我了。三十多年后，那个男孩成了两个女孩的父亲，工作换了好几份，后来跑去开出租车，或许他经常读我的文章，或许没有读过，但他一定记得那天中午，父亲在楼前电线杆子下面对他的一番忠告。三十多年后，我忆起这件小事，忽然懂得，父亲如海，咸咸的，后劲猛，在时光的淘洗下凝结成雪白的盐，初雪般闪亮，捧在手心里，我总担心它化得太快，把童年的气味一扫而光。

升入中学时，我有幸分到级部的好班。到了初二，学校在两个好班开设电脑课，为此专门开了家长会。回来后母亲阴着脸，没表态，我已经知道她的态度。班主任找我谈话，意思是这个机会难得。那段时间，我就像在同学面前矮了一大截，上课时像块木头，老是发呆。在外打工的父亲不知怎么听说了，把电话打到三楼邻居家，叫母亲去接。赶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，母亲去学校交上了三千块钱，那摞钱沉甸甸的，用报纸里里外外包了好几层，弥漫着父亲的汗臭味。那摞钱换来了我上电脑课的机会，换来了青春期无尽的虚荣，却透支了父亲血泪耕耘的家底。曾有个被退学的高三男生，与父母关系紧张，后来去了澳洲读书，他对我说，等我毕业工作了，把欠父母的钱一分不落地都

生死两相隔，思念无尽时。每到清明时节，人们都会悼念逝者，追思故人。事实上，人们追念的不仅仅是家人、挚友，还是那些难以忘怀的情感。世间之情种种，既有“盼断黄泉路，重逢可有期”的无私亲情，也有“如彼翰林鸟，双栖一朝只”的刻骨爱情，更有一世相交、终生不负的真挚友情……清明虽有时，人们对于亲人、故友的思念，却不会因时间而停止。

还给他们。我听得心里如炸惊雷。父母的钱是还不完的，因为每一分钱都带着爱的利息，而爱，自带血缘的“奶水”，是唯一无法用金钱度量的。

父亲在世时，以“缺席”的方式，参与我的青春；父亲离开后，以在场的方式，陪伴我的成长。这就像一根若有若无的风筝线，连着天上人间，放飞着牵挂与忧伤，思念在风中飘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明白，死亡是个中性词，它不带任何偏见，没有功利目光，不过是完成对生命的打包，与“生”拥有同样分量的恩典。平日里，我们的身体总是比灵魂早熟一些，历经亲人的离别，灵魂往往才能壮大一截，在被动接受中加速灵魂的拔节，继而认清生命本来的面目。

清明，如置于体内钟盘上的一个刻度，伴随节气循环。当指针指向清明这天时，意味着回溯故乡的节点到了——祭扫也好，心祭也好，都是与祖先对话，与天地凝视。此时，草木敛目，时间静止，宛如无风处的火焰，唯有两颗灵魂的促膝交谈。不管我们是否承认，死亡都是共同的归宿。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只无形无迹的风筝，倘若说飞是它的使命，那么，断则是它的宿命。大文豪曹雪芹的风筝手艺精湛，如敦敏在《瓶湖懋斋记盛》中记载：“风鸢听命乎百仞之上，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。”曹公在《红楼梦》里不吝笔墨，如宝玉的螃蟹风筝、宝钗的大雁风筝、探春的风凰风筝等等。他哪里是描摹风筝，分明是刻画人物的命运。探春的风凰风筝与另一只凤凰风筝绞到一起，又横空冲出来一个大红喜字风筝，把两只“凤凰”的线给绞断了，意味着整个家族断了线。兴与衰、荣与辱、聚与散，尽在一根风筝线的擒纵与收放。抑或说，风筝是隐喻，逃不过离别的裹挟。作家葛亮很好地继承了曹公的精神血脉，小说《北鸢》里写了扎风筝的匠人，以及文笙和雅各借放风筝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护送伤兵出城的故事，那命悬一线的风筝线也是生死的引线。还有卡勒德·胡塞尼《追风筝的人》，不知多少人像我一样被畅销书的标签所蒙蔽。那个深夜我一口气读完，竟涕泗横流，好多天缓不过劲儿来。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都是少年阿米尔，对哈桑被暴打视而不见，制造偷窃事件将他撵出家门。然而，时间终会清算，当爱与救赎如约而至，等待我们的是灵魂的审判。“在高高的上方，我的风筝像钟摆那样从一边荡到另一边，发出那久远的‘鸟儿扑打翅膀’的声音，那种总是让我联想起喀布尔冬天早晨的声音。”27年后，阿米尔收养了哈桑的儿子索拉雅，两人一起放风筝，他想起了兔唇的哈桑，想起了父亲生前的教诲。

世事荒诞，命如纸鸢，连着生死，通向虚无。此刻，我想起了父亲——那根轰然坠地的风筝线，再次接上了头。三年来，我放下了内疚，放不下疼痛，我学会了接受，学不会忘记。我坚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，却独独搁浅不了思念，以及噬骨的恨意。慢慢地，我想明白了，离别之痛恍若一场莫可名状的大病，大病初愈时分，我重新找回活着的意义，如保尔·瓦雷里在《海滨墓园》中所写：起风了，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。

起风了。天上的风筝如鸟儿扑打翅膀，忽而轻盈如羽，忽而哨音如乐，忽而又哀婉似啸……隐约之中，有人听到一个声音在低声泣诉：“爸，我想你了。”

□季福根

我的父亲季新业，生于1924年，卒于2022年，享年99岁，应了那句老话：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

父亲13岁那年，右腿生恶疮，因买不到青霉素落下残疾，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。比残疾更加残酷的是，腿疾转化为骨髓炎，这种病的发病频率很高，有时一年犯几次，每当发病时都疼得大汗淋漓。此病没有特效药，只能硬扛。“屋漏偏逢连阴雨”，同一年我的奶奶撒手人寰，家里只剩下爷爷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。爷爷看着可怜的残疾儿子，担心父亲受到继母的虐待而不肯续弦。

童年丧母和身体残疾的双重打击，没有让父亲沉沦，他告诉爷爷，要考师范，将来自食其力。他从旧书摊买了一本《四角号码字典》和一本《升学指南》，自学高级小学课程。经过两年独自寒窗苦读，终于圆了升学梦，考取了他梦寐以求的蓬黄联师，毕业后从教直到离休。一个农民的儿子，在没有老师辅导的情况下，通过自学考上师范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，不只在整个家族，就是在方圆几十里内也是首例。难以想象的是，他是怎样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，一点一点地啃书本，看懂那些繁杂的四则运算、盈亏问题及鸡兔同笼问题的。孟子说“生于忧患”，意思是忧愁和祸患能使人生存发展，父亲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孟子的话。

父亲工作认真，执教能力强，有管理才能，被提拔为小学校长。他担任校长期间，从来没有收受一分钱的贿赂，更没有贪污一分钱的公款，在三尺讲台默默耕耘30年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。

父亲不会投机取巧、趋炎附势，不请客送礼，不拉帮结伙，工资是校长中最低的。他拖着一条瘸腿，靠着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八口。家庭生活窘迫，捉襟见肘，寅吃卯粮，尤其是1959年到1961年间，我经常饿得睡不着觉，父亲从学校食堂打的馒头，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舍不得吃，总是带回家让我们吃，让我感受到无言的父爱。

父亲一生酷爱研究发明，在工作之余买来一本有关收音机的书籍反复研究，并买来各种元件，按照书中的插图焊接组装矿石收音机、电子管收音机、晶体管收音机，终于获得成功。离休后，他又利用对数计算尺发明了潮汐计算尺和千支年计算器。有人劝他申请国家专利，他说，我不为名利，纯属爱好，国家发给我的退休金已经够了。

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，他认准的理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每当星期天回来，他便

一头扎进屋里，经常通宵达旦地忙。母亲为此埋怨他浪费火油，父亲说：“我不喝酒。”母亲说：“你不喝酒，喝火油。”细想起来，父亲得的心脑血管病与年轻时熬夜有很大关系。

父亲继承了我爷爷幽默诙谐的基因，走到哪里便把欢笑带到哪里。由于腿脚不方便，他走路摔跤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，他从芦洋小学办公楼二楼摔下来，师生们都惊慌失措地围拢过来，只见他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笑着对大家说：“这下好了，我的右腿能打弯了。”哪怕是到县里开会，也总是有人趁闲暇把他围起来，让他讲笑话。他讲笑话都是信手拈来，一开口便是活脱脱一段单口相声。

怀念父亲

上世纪80年代，农村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头一年，我家的一圈粪堆在门口被人偷走了，要知道农村有句谚语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”，没有粪就没有好收成。换作别人，说不定会骂大街甚至报警，他却一笑置之，说：“要是把我家的欠债掺在粪里就好了。”退休后的第一年，他和一个钓友一起去钓鱼。那天风大，鱼不咬钩，钓友只钓到一条，他却一条也没钓到。回到村口，有人问他钓了几条，他指着钓友告诉那人，比他少一条。

“文革”时期，父亲这个小学校长也成了“走资派”。很多小学校长被查出经济问题、作风问题，对清正廉洁、作风正派的父亲，造反派找不出一丝瑕疵。但在父亲在检讨书中写道：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工作之余，晚上办公之后研究收音机是不对的。”

中风偏瘫后，父亲不得不常年卧床，他对这种囚徒般失能的生存状态深恶痛绝，一度悲观失望。但后来受到保尔和霍金的影响，他坦然面对现实，把注意力转移到读书上。父亲生前喜欢读奥勒留的《沉思录》，两本《沉思录》都被他翻烂了。到了90岁高龄，他又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父亲一生不善交际，有几个和他合得来的老伙计也都先他而去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除了家人和亲戚，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。当我们问起有谁来过，他尴尬地说：“不才明主弃，久病故人疏。”人情如纸，世态炎凉，不要说他一个耄耋老人，连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也感受到了。人的一生都是匆匆过客，有缘同行，缘分没了，一切归零。好在血浓于水，他的身边有他的子子孙孙几十人，这就够了。

父亲走了，他要去的另一个世界了。他走得很从容，仿佛奔赴另一个工作岗位；他走得很匆忙，急着要去陪伴我那同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。

别了，父亲！